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一、少年时代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名文，字逸仙，乳名帝象。

翠亨村，背靠犁头山，南望澳门，隔海与香港相对；山水相间，风景幽美。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自己连一亩地也没有，只租种两亩公尝田。种田养不活，有时便到澳门的一家鞋铺帮工。孙达成结婚后，因为人口增加，生活就更加困难了。种田、帮工不能养活一家人，便在本村当更夫，也就是夜间在村中巡逻，敲梆子报告时辰。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茅草搭成的屋子里，缺吃少穿，艰难度日。

由于家境贫困，孙中山自幼下地帮助大人锄草、打柴。他干活干得很快，时常是自己的活干完了，还帮助姐姐干。他从小在贫苦中长大，所以非常同情和他家一样的贫苦农民。很多年以后，孙中山跟一个外国人说过：他是苦力的儿子，他自己也是苦力，他是和穷人一起长大的。

孙中山因为家境贫寒，9岁时才开始读书。他在本村的私塾里读如《千字文》、《三字经》之类的旧书。当时私塾先生教书，从不讲解，只是要求学生死背书本。有一次，孙中山问老师说：“老师，我天天读书，不知书中讲些什么道理？这有什么用呢？”老师听后大发脾气，对孙中山说：“你不做人上人，就是做人下人！”孙中山还是不懂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此后便努力背诵课文，晚上如果月光明亮，就借着月光读书，以节省灯油。

孙中山自幼就很机灵。当他12岁时，他到三乡郑家送东西，走到半路僻静的地方奉家人的命令，遇到一个陌生人，要求同行。谈话间，孙中山觉察出他不是好人，但又不敢逃脱。待走到距翠亨村有十几里的一个村子时，他对那人说：“你在这里等等我，我要到亲戚家去送些东西。”那人信以为真，便在村边等候。不一会儿，孙中山从村中带来了一群人，捉住了这个坏人。原来这是一个人贩子。

孙中山年幼时，还非常喜欢听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在他出生的前两年，也就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翠亨村有一个太平天国的老兵，太平天国失败后回到家乡。他时常在孙中山家门前的一棵大榕树下，向村中的孩子讲太平军战士打仗的故事。孙中山每次都听得入了神。这位老兵还常常左手握着长胡须，右手摸着孙中山的头，对他说：“你应该做洪秀全第二。”他很敬佩洪秀全，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播下了反清的火种。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在檀香山谋生，经过辛勤耕作，生活富裕起来。1875年5月，母亲思念儿子，便携带12岁的孙中山漂洋过海，前去探望。二十多天的航海生活，使年幼的孙中山十分好奇，给他带来很多新鲜感受，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后，先是在爱槐镇大哥的商店里当学徒，不久，又到一个英国教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他初学英语，遇到许多困难。老师先让他坐在一旁静观十日，然后再从英文字母教起。他很喜欢英语课，英语学习也进步很快。孙中山因为在家乡读过私塾，中文基础较好，常在英语课之余，自己躲在一边，朗读古文。

这所学校采取的是英国式的教育，教学很严格，用诱导和强制两种方法教学。学校讲授圣经课，带领学生做礼拜；还进行消防和军事训练。这些教

学活动，使孙中山感受到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要比中国的私塾好得多。同时，他也看到英、美等国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优于清封建皇朝的独裁专制萌发了改造中国的朦胧想法。

孙中山虽然仰慕西方的文化，但他仍然穿着清朝的长袍马褂，头后面还拖着一条长辫子。他的这副模样，在学校里引起许多同学的好奇，时常有顽皮的同学，拖住他的辫子取乐，这给他带来许多烦恼。当时，东方的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在学校中受到歧视，每当同学找他取乐时，他便起而反抗。有同学劝他把辫子剪掉，他摇摇头，说：“此种陋俗，系满清强迫造成，须俟全体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草除之，否则实无益也。”他认为留辫子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清朝统治的一个象征。

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学习三年，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特别是英语，刚入校时，连字母都不认识，学习三年后，获得了第二名，由夏威夷王亲自颁发了一本中国书为奖品。1882年7月。毕业后，他又回到哥哥的店里，帮助做生意。他对经商毫无兴趣，不久，又进了檀香山的奥阿原书院读书。

奥阿厚书院是当地的最高学府，相当于高级中学。这所学校由美国人创办，学制是按美国的学制。孙中山在这里学到了更多的科学知识。同时，他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哥哥很守旧，反对弟弟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两人为此发生了冲突。孙中山不服气，便把大哥供奉的关帝像撕碎，孙眉大发脾气，命他立即回国。他原打算毕业后到美国去深造，这时只好读完一个学期后，于1883年7月回国。

回到翠亨村后，已经接受一定的新思想的孙中山，对村民的迷信、愚昧看不惯，时常说东道西。村人都说他狂妄，是受了外国的思想毒害。有一天，他和好友陆皓东来到村中的北帝庙内，把正殿内“玄天大帝”塑像的中指折断，还说：“看你这样威风，现在将奈我何？”说完，又到左廊内把“金花夫人”的粉脸刮破，并毁坏了一只耳朵。这种毁坏神像的行为，引起了村民的攻击和责难，认为他大逆不道。孙中山因此被迫离开了翠亨村。

二、香港学医

1883年11月，孙中山同陆皓东来到香港，同入拔翠书室。12月，两人同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1884年3月，孙中山转学到香港书院，即后来的皇仁书院，用乳名孙帝象注册。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沟通中西文化，每天上午讲中文课，下午讲英文课。

1884年5月，孙中山奉父母之命，回翠亨村结婚。新娘名叫卢慕贞，小孙中山一岁，是同县一个商人的女儿。结婚后，他在家住了三个月，再回香港读书。

就在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正义战争。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顽强奋战，老将冯子材率部在谅山大败敌军。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在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派李鸿章代表中国在天津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卖国媚外，给年轻的孙中山很大刺激。

1886年，孙中山从香港到广州，在博济医院附设的医科学校学医。他学医的意愿在檀香山时已经萌发，经过中法战争的刺激，便决心学医，作一名医生。其目的，依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于“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1887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丽雅氏西医书院。该校设备较好，师资雄厚，学制为五年，毕业后即可以行医。为了以熟练的医术，作为“入世之媒”，在校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同时，还广泛阅览历史、地理、农学、达尔文进化论等。他对中国地理尤其感兴趣，时常面对宿舍里的一副中国地图，感叹祖国山河的沦丧，激励自己爱国的情怀。

孙中山在学习医术的同时，对政治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在香港，他同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结为好友。尤列，字少纨，广东顺德人，出身书香世家，他曾到过日本朝鲜，也游历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是一位会党成员。从而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坚定了反清意志。1886年尤列在广州同孙中山相识，1888年到香港，在华民政务司任书记，同孙中山往来日益密切。陈少白，原名闻韶，广东新会人，原为广州格致书院的学生，1889年经孙中山介绍，转入香港西医书院。杨鹤龄，与孙中山同村，自幼相识，其父在香港经商。他们四个人时常在杨鹤龄家的商店里议论时政，抨击朝廷，探讨革命道理。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被当时人称为大逆不道，亲友们则称他们为“四大寇”。他们都十分仰慕洪秀全，孙中山称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四个人都把自己同洪秀全相比，也乐意接受“四大寇”的称号。但当时这“四大寇”，只是在口头上议论反对清政府，并没有付诸行动。

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丽雅氏西医书院。在毕业典礼上，他因成绩优异，获得了三本医书，由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颁发毕业执照。

毕业后，孙中山到澳门，被聘为镜湖医院的西医师，成为该院第一个用西医治病的医师。1892年11月，他离开镜湖医院，借钱在澳门开办中西药局行医。孙中山医术高超，为一个患者开刀取出肾结石，从此，声名鹊起，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葡萄牙籍医生嫉恨孙中山，对他进行种种刁难，排挤。不得已，孙中山于1893年将药局迁到广州，改名东西医局。

孙中山对待病人态度和霭可亲，遇有贫穷的病人，便不收诊金。他的声

名很快又在广州传开，业务也蒸蒸日上，开设了分药局。1893年12月，广州的《中西日报》刊载了一篇感谢中山先生的启事。署名武泌的启事称赞孙中山“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

通过行医，孙中山结识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有政府官僚富、商、地方绅士，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由于接近官场的机会多了，孙中山对清政府的腐败有了深一层的了解，认为“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他毅然决定放弃医人的职业，而专门从事医国的事业。

三、创建兴中会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期间，广泛结交同志。1893年冬，27岁的孙中山经常同尤列、郑士良、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的抗风轩集会，议论时局。陆皓东认为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外患很严重，不宜大动干戈，主张治标；孙中山则主张治本，也就是推翻清政府，结束满人的统治。他们经过几天的辩论，最后确定了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组织革命团体。孙中山提议定名为兴中会。当时这个组织没有正式成立，但却为兴中会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孙中山和同志们谈论革命，准备革命，但是，怎么样达到革命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1894年初，他回到翠亨村，闭门谢客，奋笔疾书，草拟了一份上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意见书，提出中国应当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实行改革，以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还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纲领。

这一年的春天，孙中山同好友陆皓东到上海，找到同乡郑观应，求他写信介绍他们去见李鸿章。6月，他们由上海北上到达天津，托人将意见书交给李鸿章，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上书失败。

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尽管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牙山一仗清政府的海陆军战败全国震动。孙中山在北京目睹了种种社会现象，痛心地说：北京“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清政府已经无法挽救，和平的方法已经不可用了，只有革命，别无选择。于是，他们从北京到武汉，偷偷观察了长江上的军事设施。9月，孙中山从上海到檀香山。

檀香山是华侨聚居的地方，他们大多数来自广东。这些华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在那里安家立业，但时常受到当地政府的种种限制和当地人的歧视，因此，都希望自己的祖国早日独立富强起来，特别是一些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后，在华侨中宣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思想，得到一批思想进步的华侨的响应。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家里主持会议，成立兴中会。出席会议的有20余人。李昌宜宣读誓词，参加会议者举右手宣誓，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察监。”宣誓以后，大家便讨论兴中会的宣言和章程，并推选职员。兴中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何宽分别担任正副主席；同时，还讨论决定募捐革命军费，并规定会员每人缴纳会费五元。

在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

《章程》还向国人郑重宣告：“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孙中山第一个向国人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兴中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革命的开始。从以，他便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途。

兴中会成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屡屡遭受失败之际，大连、旅顺相继失守。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的一月，清政府派遣官员前往日本议和，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孙中山决定回国。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准备乘机发动起义。他到香港后，便邀

请旧日的朋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人，讨论扩大兴中会的组织。2月21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总机关设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为了躲避警探的耳目，挂牌“乾亨行”以作掩护。总机关由杨衢云、谢赞泰主持。

3月13日，孙中山同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商议起义计划。16日，举行兴中会干部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攻取广州作为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在香港挑选三四名健儿作为参加起义的骨干力量，然后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成员、民间的绿林军和清政府的防营。这次会上还一致同意采用陆皓东绘制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时革命军旗。起义胜利后，即用青天白日旗代替清朝的黄龙旗。

孙中山等人密谋起义的风声，逐渐为外界所闻，8月27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了兴中会的机关“乾亨行”。29日，孙中山与同志们在香港西营盘杏花楼酒家开会，商议广州起义的具体计划。经过反复商议，最后把起义的日期定在10月26日，即农历的九月初九，重阳节。他们准备利用重阳节香港民众回广州扫墓的机会，香港参加起义的人员混在其中，齐集广州，举行起义。

为了扩大组织，更好地联络群众和便于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孙中山先期到达广州，在双门底设立农学会。孙中山利用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这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任两广总督，贪污腐败，人民怨声载道；又因甲午战争结束，李瀚章将招募来的四分之三的军队解散，却又不发给路费，散兵拥挤在广州城，愤愤不平。而巡防营的兵丁则在城内四处抢掠，搞得人人惶恐不安。孙中山等人认为这是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便加紧活动，联络北江、汕头等地的绿林豪杰，三元里的乡团和香山、顺德的会党；同时，派陈少白到上海，联络革命同志。

按原计划，在香港召集三四百人作为起义时的先锋队，由朱贵全率领，在重阳节的前一天，即10月25日，乘晚班船于次日黎明时登岸，混入广州城中。把武器装在木桶里，巧妙地运进城内，然后分兵四路，攻击总督衙署；同时，先已联络好的北江、汕头、香山、顺德的绿林军、乡团及会党分路在城外响应。起义时用的口号是“除暴安良”。孙中山负责指挥全军，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后勤，专门运送人员和武器。

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不料，起义的前一日，在广州因参加起义人员朱淇的哥哥朱湘见朱淇在起草讨伐满清的檄文，恐怕自己受株连，便向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一面派人严密监视孙中山，一面向接替李瀚章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报告。谭接到密报后，急忙调一千余名防营回广州城进行防卫。李家焯带人搜查了革命机关，查获了军旗、枪械，逮捕了陆皓东、程耀宸等6人。

这一天，孙中山正在一姓王的绅士家参加婚宴，见周围有清政府的兵丁在巡视，觉察到起义的机密已经泄露，自己已受监视。他非常镇静，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这些人大概是来捕我的吧！”大家听了都十分惊讶，兵丁们也没敢动手。宴席结束后，孙中山从容地回到住所。第二天，即10月26日上午，孙中山接到杨衢云自香港发来的电报：“货不能来”。

原来在香港的杨衢云在队伍出发前，因武器分配不均，人们意见纷纷，不听从指挥，无法按原计划出发，所以向孙中山发电报，希望起义能延缓两日。孙中山接杨衢云电报后，因知机密已经泄露，清广州政府已经严加防备，

便回电报说：“货不要来，以待后命”。谁知电报到 27 日才收到，此时，香港的起义人员和枪械已经上船。杨衢云立即给孙中山回电报，说：“接电已迟，货已下船，请接。”船到广州，已经是 10 月 28 日，起义人员及武器便全部被清政府截获，朱贵全、丘四等 40 余人被捕。11 月 7 日，陆皓东、朱贵全等人被杀害。孙中山后来称陆皓东是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人。

事发后，孙中山没有立刻离开广州，而是藏在城内，处理善后，待文件销毁，革命党人大部疏散后，才于 29 日化装成工人，混在人群中，乘一只小轮船到澳门，10 余天后到了香港。至此，准备了大半年的广州起义，因机密泄露而告失败。

这次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显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决心。

四、伦敦蒙难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千元缉拿孙中山。孙中山留住香港已不安全。11月17日，便同陈少白、郑士良乘船前往日本横滨。在横滨孙中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结识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及黎炳垣等人，组成了兴中会分会，推冯镜如为会长。孙中山等人在旅日侨胞中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但多数华侨都认为，反对朝廷是大逆不道，鼓吹革命困难较大。孙中山决定远游美洲。

1896年1月，孙中山在离开日本的前夕，决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发辫，并脱去了长袍，改穿西装，独自冒险前往檀香山。这时，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携孙中山的妻子及儿子、女儿已经到檀香山，住在孙眉的家里。孙中山阖家团聚，自然欣喜非常。他在茂宜家中住了几天，便急急忙忙到檀香山正埠去会见旧日的兴中会会员，准备重整党务。经过孙中山的宣传和发动，很快，华侨中的革命风气便又振作起来了，他感到十分欣慰。

1896年6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往美洲，打算到那里联络华侨，募集革命经费。途中，凡遇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他便进行宣传，鼓吹救国反清，但由于华侨中的多数怕听反清造反的言论，使孙中山感觉到美洲的华侨比檀香山华侨更为闭塞。因清政府驻美国公使是满州人，朋友们都劝孙中山，不宜久留。他便于9月23日由纽约前往英国利物浦。

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往香港后，清政府把他看成最重要的“逃犯”。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一面致函两广总督谭钟麟，要求他立即派大批侦探到香港、澳门、西贡、新加坡等地跟踪缉拿孙中山；一面通知各驻外使馆、领事馆，密切注意孙中山的行踪。孙中山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孙中山的行踪被中国驻美国使馆侦知，驻美公使杨儒立即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说：孙文于9月23日乘“麦竭斯底”号轮船到英国黎花埠登岸。

驻英公使龚照瑗得知孙中山即将到英国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雇了外国侦探，专等孙中山的到来。派人同英国政府交涉，请英国政府代他们缉拿孙中山，英政府拒绝后，他们便又设计，想办法诱骗孙中山到使馆，用七千英镑的高价雇船，准备把孙中山装在一只木箱内运往广州；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行，便打算把孙中山毒死在使馆内，然后把尸体解运回国。一张罪恶的大网正在向孙中山张开。

9月30日中午，孙中山一路风尘抵达利物浦，10月1日到达伦敦。孙中山到达后，便去拜访原香港丽雅氏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经康德黎帮助，住在距康德黎寓附近的一家旅馆内。10月11日，适逢星期天，孙中山从住处去康德黎老师家，打算跟他到礼拜堂祈祷。正在行走间，从后面跟上来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孙中山：“先生，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中山说：“我是中国人。”那人又问：“你是哪个省的？”孙中山回答说：“广东省。”那个人仍用英语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广东人。”不一会，又走过来一个中国人，同他们说话，两个人一左一右把孙中山夹在中间。等快到康德黎家时，两个人坚持要孙中山进一座楼内叙谈。孙中山哪里知道这就是中国使馆，便同他们二人进了门，从此，便被幽禁在使馆的第三层楼上。

孙中山身陷牢笼，自知难免于死，但他绝不束手待毙。他千方百计将自

已被囚禁的消息传递出去，想了很多办法都因为看守太严没有成功。情况万分危急。幸亏得到英国仆人柯尔的同情和帮助，才把他写给康德黎的求救信传递出去。康德黎收到孙中山的信后，见义勇为，四方奔走。10月19日，康德黎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将孙中山被诱骗的经过写一份报告，呈交外交部。英外交部经调查属实，便决定对此事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干预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0月23日下午，孙中山获得自由。

孙中山脱险后，写信给英国政府和报界，对他们的慨然相助表示感谢；同时，给柯尔付了酬金，以示感谢。尔后，孙中山便着手撰写《伦敦蒙难记》。经过这一变故，他对清政府的专制残暴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自1896年11月至1897年7月，孙中山一直留在欧洲。在英国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去看书，一去就是大半天。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但最感兴趣的还是有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面的书籍。因为他明白，要想改造社会，必须首先了解社会政治问题和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所以对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他“攻之甚勤”。

孙中山在留英期间，不仅勤奋攻读，努力汲取书本知识，更重视考察社会政治风俗，结交各方面的人士。

孙中山在英国的考察，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通过对欧美社会的考察，不仅产生了民生主义的革命思想，还具体地确立了民权主义的内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已经看出，要想解决民族压迫，必须同时解决民权问题和民生问题。至此，孙中山完成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的构想。

孙中山在欧洲考察几个月，思想认识和政治理论虽然有很大收获，但因为英国没有中国留学生，华侨也很少，很难开展鼓吹革命的工作，他认为久处欧洲，必将“旷废革命之时日”，故于1897年7月离开英国前往日本。

五、成立中国同盟会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到达日本横滨。由于清政府悬赏缉拿，孙中山不能回国，香港英国当局也不允许他在香港居留，他只好在国外流亡，而日本距离中国较近，消息比较灵通，便于策划革命行动，所以，直到1900年，他一直住在日本。在这段时间内，他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日本朋友。9月，孙中山移住东京，化名中山樵，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他在华侨中奔走，宣传革命思想，和同志们聚谈，准备再次发动起义。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已经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燃起。不久，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进行武装干涉。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进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他亲自率领从日本乡下招募来的军人和兴中会会员乘船去香港。船到香港时，因孙中山在船上，香港政府便不允许这艘船靠岸。孙中山只好在船上召集同志们开会，讨论武装起义的计划。大家决定，这次起义以新安县的绿林军和嘉应州的三合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武器，在广东省的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

这一年的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已经集结了六百多革命志士。但是，由于军械不够用，军费也一时难以接济，孙中山便命令郑士良率领众人在这个地区隐蔽起来，静待时机。可是，时间一久，风声传了出去。清政府闻讯，十分恐慌，派军队镇压。起义军为了先发制人，便于10月6日夜晚袭击清军驻地。起义军同清军血战了半个月，虽然士气旺盛，但终因枪弹和粮食断绝，外援又没有希望，郑士良忍痛解散全军两万余人，自己率领部分志士退回香港。革命志士史坚如、邓荫南原计划在广州响应惠州起义，没有成功，便乘广州出兵镇压惠州起义的机会，暗杀了两广总督德寿，史坚如也壮烈殉难。

惠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并没有灰心，他以更加坚定的决心，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孙中山继续在各地奔走，建立反清的革命组织。1902年，他在越南河内成立河内兴中会；1903年，在日本建立青山军事学校，发展会员；同年，又到檀香山，当地的兴中会分会改组，改名为中华革命军；1904年，到美国组织洪门致公堂，在致公堂的新章程中，溶入了兴中会的政治纲领。1905年春，孙中山到欧洲，奔走在比利时、英国、德国和法国之间，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建立组织。

与此同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在华侨中的活动。在1900年至1905年的5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于日本、南洋、檀香山、欧洲、美洲，所到之处，都深入到华侨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孙中山在华侨中的威望也日益增高。在日后发展革命组织、募集革命经费的工作中，都得到了华侨的很大帮助。

孙中山在海内外爱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树立了很高的声望。有人称孙中山是“大英豪”，章太炎则把孙中山比作汉朝的刘邦。国内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仰慕孙中山，“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居住期间，前往访问的留日学生络绎不绝。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指导下，在日本和欧洲的留学生，相继建立起了许多革命团体。就这样，孙中山把大批的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正当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发展组织的时候，国内的一批爱国的知识

分子也先后组织起了反清的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著名的革命团体有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

华兴会是由湖南籍的留日学生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等发起，1904年2月在湖南长沙明德学堂的一个校董的家中成立的、黄兴被推举为会长，有会员五百余人。华兴会成立后，联络会党，秘密策划武装起义，计划在这一年的11月在长沙发动起义，因密谋泄露，没来得及起义便失败了，黄兴等人逃亡日本；光复会，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担任会长。会员入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会员大多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知识分子，也有部分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于1904年7月由吕大森、刘静庵等人在湖北武昌成立，共有会员四十余人，吕大森被推举为所长。这个团体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反清的革命宣传。

以上三个革命团体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这些团体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是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目的，革命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义和团运动后，人民的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孙中山看到了这一有利的形势。他感觉到已成立的，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小团体，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困而便产生了把各个小团体的力量汇集起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大党的想法。当他于1905年春在欧洲留学生中建立起了几个革命团体后，便决定再次去日本。因为留日学生的革命情绪这时已经十分高涨。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横滨。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积极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党而努力奔走。当他得知华兴会首领黄兴正在东京时，便立即前往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同黄兴相见。两人畅谈了革命形势，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孙中山提议，兴中会同华兴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了解到华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较大，便决定首先对华兴会的骨干人物做工作。7月28日，孙中山访问《二十世纪之友邦》杂志社，会见了陈天华、宋教仁等人，同他们商谈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事。孙中山诚心诚意地对他们说：“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江……，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在座的各位，对孙中山的说法都表示同意。

7月30日，孙中山邀请了各省在日本留学的爱国学生及有志于革命的华侨七十余人，在东京的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的会所开会。参加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和其他组织的成员。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言，慷慨陈词，力图说明全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会上，大家讨论确定了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有人提议取名叫“对满同盟会”，这个名字显然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表示不赞成，经过讨论，确定取名为“中国同盟会”。关于统一后组织的政治纲领，孙中山提议采用兴中会的十六字誓词，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虽然有人对“平均地权”提出异议，经过孙中山的解释大家便同意了这个政治纲领，并且决定把这十六个字写在盟书上。最后，大家推举黄兴等8人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

8月13日，孙中山出席由黄兴、陈天华等人发起的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一千三百多人到会，会场内外，人潮涌动，都争着一睹孙中山的风采，

都把他看成“中国英雄中之英雄。”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革命青年“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到会的人都受到很大的鼓舞。

8月20日午后2时，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二百多人到会。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首先由黄兴宣读他们起草的《同盟会章程》，共30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章程。接着，选举干事会，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同时，还确定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1905年11月16日，《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发刊词，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此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民报》为阵地，展开了论战。他们辩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还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些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扩大同盟会组织的工作。他选派得力的干部到各地去，建立同盟会的组织。他本人也在1906年的春天到新加坡，建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此后，海内外许多地方都相继建立了同盟会的分会。

中国同盟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同盟会的旗帜下，各派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六、武装起义

同盟会在开展宣传工作，扩大组织的同时，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以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孙中山亲自到南洋各地奔走，动员华侨，进行捐款。为了各地进行武装起义时有一个共同的方略，1906年11月同盟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同黄兴，章太炎等讨论制定了《革命方略》，确定了组织国民军的规则，还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准备起义时采用。

在同盟会成立后最初三年的时间里，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06年秋，在东京的黄兴派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回国，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策动会党群众，于这一年的12月初在浏阳、萍乡发动武装起义。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下层群众纷纷响应，很快起义军遍布附近的几个县。起义军士兵头缠白布巾，手里拿着白旗。参加起义的人员大多是这个地区的农民，也有一部分矿工和手工业者。大家公推龚春台为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宣布破除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清政府前后派数万名军队镇压，起义失败。起义人员惨遭血腥屠杀，刘道一、蔡绍南等被捕牺牲。刘道一牺牲时年仅22岁。

这次起义第一次在中华大地打出了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军的旗号，公开讨伐清朝廷，震动了大半个中国。这次起义也是同盟会会员第一次流血，它在同盟会会员中引起震动。此后，东京的同盟会会员纷纷回国，发动起义和从事其他反清活动。

在萍浏醴起义和留学生纷纷回国的形势下，孙中山认识到，具体领导国内各地起义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便从日本前往河内，谋划在广东、广西边界的钦州、廉州、潮州、惠州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再向中原发展，打开夺取全国胜利的局面。

从1907年上半年开始，广东、广西边界地区的起义此起彼落，连绵不断。这年的5月，在同盟会会员、华侨许雪秋的带领下，余继成率领会党群众在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誓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起义军同派来镇压的清军进行了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黄冈被清军夺回，起义失败。许雪秋逃亡香港，后到新加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黄冈起义的消息传到惠州，同盟会会员、华侨邓子榆6月2日在七女湖发动起义，响应黄冈起义。起义军截获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清军多人，各地会党纷纷响应，队伍增加到二百多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忙派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终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而失败，大部分起义人员退入山中。

潮州、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孙中山又派黄兴、王和顺到广西的钦州、廉州一带活动。1907年9月，王和顺率领起义军攻占防城，以中华革命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安民布告，很快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王和顺留下一部分人员留守防城，自己率领大部起义军向钦州进发。钦州城内守军已有戒备，王和顺便改道进攻灵山，奋战两天两夜。起义军战士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且没有援军，无法继续作战。王和顺不得已，只好率领部队退入大山中。起义宣告失败。

防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又委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计划攻取广西通

往越南的险要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黄明堂和关仁辅等人联络镇南关炮台的守兵为内应，12月2日，率领起义军一百多人，从山背后，用绳子攀登，攻占了镇南炮台。炮台的守军纷纷逃散。起义军乘胜又占领了镇中、镇北炮台，并缴获了大批枪械。12月3日晚，孙中山在河内接到黄明堂报捷的电报，非常高兴。第二天，他率领黄兴、胡汉民等二十余人从河内出发，直奔镇南关，当天到达阵地，在镇北炮台受到起义军的热列欢迎。孙中山和同来的同志们同起义军官兵一一握手，亲切慰问。在炮台前的空地上，孙中山向守军发表讲话：感谢大家奋勇起义，我们要和全国的同胞一起，把清朝的皇帝推翻，建立起一个新的富强的共和国，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大家都有田地耕种了。贼军必败！我们必胜！兄弟此次入关是和大家一起奋斗，把革命革到成功。孙中山的话音在山间回荡，炮台上下，气氛非常热烈。

第二天清早，孙中山又率领同志们到镇中、镇南炮台，看望驻守炮台的起义官兵，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孙中山把从河内带来的军饷和枪械一一交给黄明堂，随后下山视察阵地。当孙中山一行回到镇北炮台后不久，清军向炮台发来一炮，这是试探性的一炮，孙中山用望远镜观察以后，便命令炮手发炮还击，一炮击中了敌人的营地，敌人再也没敢发炮。可是，阵地上敌人还占据着一座地势较高的炮台，清军居高临下，用步枪频频向镇北炮台射击。孙中山和黄兴先后抄起步枪还击，击伤两个清军，打死了一个清军。孙中山站在山坡炮台上，看着奔忙的起义兵士，看着飘扬的青天白日旗，豪情满怀，他激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攻击清军。”孙中山作为领袖，身先士卒，亲临阵地，亲自射击敌人，在历史上也不多见。事后，他把自己在这次指挥作战时戴的帽子保存下来，在帽子的里面亲笔写下了“镇南关占领纪念，高野”的字样。高野是孙中山曾经用过的化名。如今这顶帽子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清政府接到起义军占领镇南关炮台的消息后，十分惊慌，紧急电令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必须在七天之内收回炮台。清广西提督龙济光、镇南关防军统领陆荣廷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四千多名清军进行反攻，直扑镇北炮台。起义军奋勇还击，从12月8日夜一直奋战到9日下午，清军先后抢占了四方岭和小尖山。起义军全部退到炮台内坚守。9日夜，守军已弹尽粮绝，黄明堂只好率领起义军突围，退入越南境内的大山中。镇南关起义也告失败。

1907年7月6日，在安徽安庆，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巡警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举行起义。他先是在开学典礼的会上，借向安徽巡抚恩铭递呈学生名册时，掏出短枪，击伤恩铭。不久，恩铭死亡，其他文武官员四处逃散。徐锡麟同陈伯平率领百余名巡警学校的学生进占了军械所后，被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锡麟等被捕牺牲。与此同时，女同盟会员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响应。因安庆起义失败，她被捕后从容就义。

1908年，同盟会又先后发动了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两次起义也都告失败。

同盟会发动起义，虽然都遭到失败，但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前赴后继，愈挫愈奋。他们冷静下来，认真总结失败的原因，寻找新的途径。以往的几次起义，大多都是依靠会党，而会党的成员都缺乏训练，组织也不严密，又缺少枪械，所以很难成事。此后，革命党人便把注意力转向清朝的新

军。新军组织训练都较好，武器装备也精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是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思想。所以，同盟会便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到广东新军中去，倾注很大的精力，做宣传发动工作。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的力量发展很快，兵士加入同盟会的人越来越多。

新军的发动工作已经成熟，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便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日期初步定在 1910 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起义的领导人倪映典到香港报告工作，共同商议元宵节起义的具体事项。不料，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

2 月 9 日，正是旧历除夕，士兵放假，进城的几个士兵因为取一枚图章同警察发生了冲突。以这件事为导火线，大年初一，城外的新军携带棍棒、木枪进城，同警察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清广州官员劝解无效，便下令关闭大东门、小北门。

倪映典闻讯，于正月初三早晨急急回到广州。这时，新军已经很难控制，又缺乏子弹，而清军却全副武装。倪映典看到这种情形，想取消起义计划已经不行了，只好宣布起义，集结新军士兵三千多人，大家推举倪映典为总司令，倪映典当众宣誓：“愿为革命战死！”兵士们齐声高呼：“愿为革命战死！”整队向城内进发。

这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也正率领清军向大东门、小南门三路迎战，行到东门茶亭时，两军相遇。起义军奋勇向前，司令倪映典身穿蓝袍，手里举着青天白日旗，来往指挥。两军相持。清巡防新军管带童常标、李景濂来到起义军阵前，要求见倪映典。李景濂是同盟会员，前一天倪映典还同他联系过，以为他这次来是带领队伍反正的，没有怀疑其中有诈，便从容地跟随他们二人到清军营地会谈。当倪映典走出清兵营回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把他打死。司令突然死去，起义军顿时大乱，难以再组织进攻，队伍很快便溃散了。准备很久，仓促发难的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了。

七、槟榔屿会议

广州新军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旧金山。他闻讯后，并没有因此而悲观。他打算经檀香山去日本，由日本再到一个靠近中国的地方，以便发动和领导更大规模的革命行动。

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到檀香山。他拟定了一个再次起义的计划，并且写信告诉黄兴，不久，正在新加坡筹款的黄兴、赵声先后回到香港，召集在香港的同志开会，讨论中山先生的革命计划。黄兴于5月13日给中山先生回信，叙述了香港同志讨论的意见。他们认为，下一次起义还是必须在广州下手，而且还必须在军队中下手。他们还认为广东之外，还须同时联络各省的军队和会党。关于组织人才，黄兴在信中提出：“必须求之于各省同志中”，并打算一但筹到经费后，便立即去日本召集已经归国的有胆有识的革命同志来日本开会，研究行动计划，然后回国内分头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

6月10日，孙中山由檀香山到横滨。当天便急急同几天前到达的黄兴会面。他们再次详细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孙中山到日本的消息被清政府侦知后，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限令孙中山务必在6月25日前离开日本国境。不得已，孙中山离开日本，于7月19日到达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住在四间店街。

孙中山正确地估计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认为“时局大有可为”，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孙中山密切关注广东新军的工作，他和黄兴、赵声、胡汉民布置留在新军中的革命同志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当时，虽然清广州政府对新军严加控制，但革命党人仍然利用各种办法坚持在新军中的工作。担任报馆主笔的朱执信和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威望，继续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1910年的四五月间，因为起义失败而逃亡到各地的广东新军一标（相当于团）几千人，大部分已回到家乡——广东高州。他们在乡间进行宣传，并且四处收集武器。孙中山写信给朋友，很有信心地认为“我们必能迅速恢复在广州军队中的地位，而且力量将比前远为壮大。”

1910年，风起云涌的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各种社会矛盾正在迅速激化。中国的社会呈现出了空前的大动荡。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湖南长沙的枪米风潮是这一年震动全国的大事件。

下层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由来已久，几乎波及整个中国，到1910年，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其中以莱阳的抗捐斗争规模最大。自从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农民忍无可忍，5月21日，数千名农民在联民首领曲诗文的率领下拥入县城，要求用他们的积谷（秋收后农民自愿拿出一部粮食集中放在一个仓里，以备荒年时用）来抵捐税，当他们得知积谷已被官绅吞食，农民更加气愤，一万多农民进城请愿，要求发还积谷。新任知县（县长）奎保派人到柏林庙捉拿曲诗文，7月4日，五六万农民愤而包围县城，救出曲诗文。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毁房屋八百多间。农民死伤三百多人。

20世纪初，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五省的饥民，向地主大户抢米，甚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发生，到1910年，这种风潮发展到高峰。风潮闹得最大的是湖南长沙的饥民。这一年春，因上一年水灾，湖南的一些地区稻谷歉收，官僚劣绅同外国商人勾结，抢购谷米，囤积居奇，

哄抬粮价。长沙附近几个县的饥民涌入长沙。这时，粮店大米的价钱一天要涨好几次。有一户卖水为生的黄姓人家，因无钱买米，全家投水自杀，激起了民愤。4月13日，数千名民众包围巡警局；傍晚，两万多人，拥向巡抚衙门；当晚米店被抢，14日，全城罢市。巡抚岑春蓂下令镇压。民众愤而放火烧了巡抚衙门、税局银行及外国人的教堂、洋行。18日，外国军舰配合清军镇压。

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相互激荡，有力地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形势，看到民心已经大变。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孙中山决心破釜沉舟，再大干一场。

1910年10月初，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槟榔屿。他们三个人情绪都不高。孙中山问他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他们都相对无言回答。孙中山向他们说明目前所面临的大好形势，对他们进行安慰和鼓励。他们看到逃亡海外的革命同志穷困潦倒的境况，都认为目前生活都很困难，那里还有钱作活动经费。孙中山热情地鼓励他们说：“今日吾党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孙中山自告奋勇担当筹款的艰巨任务。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强烈地感染了大家，都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先生再次组织武装起义的主张。

孙中山亲自发信，约集南洋各地及国内部分同志到槟榔屿开会，11月13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在槟榔屿打铜街一二号党部举行秘密会议。大家就款项的筹措、起义的地点、队伍的组织及取得广州后的军事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回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在南洋筹款，他自己则暂留槟榔屿。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紧罗密鼓地进行起来。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经费的筹集工作。他向同志们反复说明筹足经费的重要，认为“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他自己则担任筹款的重任。11月中旬，他召集槟榔屿的革命同志和爱国华侨开会，商议筹款事。会上，孙中山号召：“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语气决绝，感人肺腑。参加会议的人当场认捐了八千元。

南洋英国殖民当局，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命令孙中山出境。当他得知南洋筹款稍有头绪后，便于1910年12月6日离开槟榔屿，经科伦坡前往美洲，12月19日抵达纽约。此后，奔走于美国、加拿大之间，在爱国华侨和革命党人中宣传革命，动员捐款，一日也没有停息。到1911年3月，已募集了所需款项的一半。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领一百余名革命党人进攻总督衙署，打响了广州起义的枪声。当天夜间，敢死队员们在广州城的大街小巷同清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而失败，86人牺牲，幸存者寥寥无几。

广州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孙中山正在由纽约赴芝加哥的途中，获此消息，他心情万分沉重，立即打电报到香港，询问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的安危。当得知他们都已脱险时，才稍稍感到一些安慰，对身边的人说：“天下事尚可为也。”为了妥善处理善后，孙中山又不辞辛苦，继续筹款。

八、武昌起义

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像一声春雷，震撼着中国大地，鼓舞人们继续奋斗。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在湖南、湖北、四川相继掀起了保路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成同盟会中部总会，总机关设在上海。

1911年5月，湖北最大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酝酿联合。文学社，1911年1月下旬在武昌成立，蒋翊武任社长。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开展工作；共进会，由焦达峰、孙武等人发起，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1909年在武昌设共进会总部，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经过几次协商，两个团体达成了联合的协议。不久，保路运动如火如荼，武汉也沸腾了。《大江报》发表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发出了武装起义的信号。

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清政府把驻防湖北的新军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一营调往四川，随后，又将四十一标调往宜昌、沙市。武汉地区防务空虚。

新军陆续外调，加强了武汉革命党人的紧迫感。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的寓所开会。大家一致同意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而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同满清拼搏。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联合大会。会议确定10月6日（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决定当天就组成军政府。

就在召开大会的这天下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驻在南湖的新军八标三营两个士兵要请长假离营，同营的士兵设宴送别。席上行令劝酒，慷慨悲歌，排长闻声跑来干涉，士兵愤而拖炮暴动。这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流言到处传播，闹得满城风雨。清政府非常恐慌。湖广总督瑞澂调集兵力加强对总督衙署的防卫，并下令收缴各营士兵的子弹，中秋节禁止兵士外出，加派城门岗哨，实行宵禁。10月6日起义已经难以实行，起义总指挥部决定，将起义日期改为10月11日。

10月9日，正当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一天的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装配炸弹，在旁边观看的人不小心，把纸烟的火屑飘落到炸药中，顿时引起爆炸，声震四邻，浓烟滚滚。孙武受伤被送往医院。俄国巡警听到爆炸声赶到现场，发现那里原来是一个革命机关，搜出了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和印刷好的钞票。起义的秘密因此泄露。湖广总督下令关闭四方城门，速调巡防营、守卫队大肆搜捕革命党。

严峻的意外事变，迫使革命党人迅速作出决定。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立即行动。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在10月9日的下午5时发布起义命令，规定当天晚上12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信号，城内的一齐行动，所有起义部队一律以左臂缠白布为标志。命令写好后，派人送去往各标营；同时派汤玉麟向南湖炮队传达。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在总指挥部等候。临近晚12点时，一队军警突然闯进指挥部。刘、彭被捕，蒋乘机逃脱。革命党人杨宏胜在运送子弹途中被捕。晚12点，各标营的革命党人急切地等候着南湖方向的炮声，却一夜寂静。原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汤玉麟，因城内戒备森严，没法出城，命令没有送到。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

宏胜三人被杀。敌人按名册继续大肆搜捕。武昌城乌云密布。

三位同志的牺牲和敌人的疯狂搜捕，激起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在领导机关被破获，领导人四散的情况下，新军各标中的革命党人秘密串连，相互约定，仍然按照原来的布署，在10日晚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

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第八营队官熊秉坤是共进会会员，工程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在士兵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天的上午，彭、刘、杨被杀害的消息传来，熊秉坤立即召集会议，布置起义。夜幕降临后，第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来查哨，看到金兆龙等人臂缠白布，正在往枪里装子弹，立即警惕起来，责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准备不测！”陶大怒，吼道：“你要造反吗？”金高声回答：“老子就要造反，你能怎么样？”陶猛扑过去，扭住金的手腕，要护兵把他捕起来。金兆龙大声疾呼：“同志们赶快动手！还等什么！”一直站在旁边的程正瀛立即举起枪，猛击陶的头，陶抱头逃跑，程在后开枪，将陶打死。

枪声就是命令。全营士兵纷纷端着枪从住棚里跑出来。一时枪声大作，军官们四处逃散，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全营。熊秉坤率领队伍立即向楚望台军械所猛扑，准备夺取枪弹，充实队伍。守卫军械所的也是工程第八营的士兵，听到枪声后，革命党人罗炳顺巧妙地骗过反动长官，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然后，罗炳顺向天空鸣枪，宣布起义。这时，熊秉坤率领的起义军赶到。楚望台高地被工程第八营占领。工程营共有士兵四百多人，纷纷赶到楚望台集合。熊秉坤以总代表的名义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并布置守卫楚望台和攻击总督署的战斗任务。一拥而来的各路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秩序有些混乱，熊秉坤感到指挥有些困难。第八营左队队长吴兆麟这天晚上也在楚望台，士兵宣布起义时，他躲到库房附近，没有露面。他军事知识丰富，在士兵中威信很高。有人提议请他出来担任总指挥。熊秉坤根据大家的意见。便同各队代表商量，决定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由熊秉坤协助。

第二十九标的起义部队在总代表蔡济民的率领下到达楚望台。两军会合后，商讨共同进攻总督署的方案。随后，驻守在附近测绘学堂的学兵和由城外开来的各路起义部队也陆续来到楚望台。当晚，南湖八标的炮队也宣布起义，他们拖着一门大炮，在楚望台和蛇山两个高地布设阵地，一齐向总督署开炮。隆隆的炮声，为起义部队大壮声威。

这时，敌军在武昌城的西南角，起义军在武昌城的东北角对阵。

当时，驻在武昌城内外的兵力共约20个营，九千余人。当晚陆续宣布起义的约三四千人，清军尚有五千余人。起义军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向总督署发起进攻，想尽快摧毁这座湖北的最高统治者的堡垒，打乱敌人的布署，先后发动了三次进攻。在第三次进攻时，起义军占领了八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澂见形势危急，便让统制张彪坚守，自己从督署墙上挖开的一个洞里爬出去，逃到停泊在江边的楚豫兵舰上。张彪见瑞澂已经逃跑，自己的司令部也被起义军占领，便带着辎重营逃到汉口的刘家庙。

经过反复争夺，天快亮时，起义军攻占了总督署。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武昌全城克复，一面鲜艳夺目的十八星旗，在黄鹤楼上升起。

10月11日和12日，汉口、汉阳相继被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升起了革命的大旗。

革命胜利了，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政

权。10月11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革命党人便聚集在武昌阅马场省谘议局开会，商讨建立军政机构。当天，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又称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电请黄兴、宋教仁、居正到湖北，并请他们转告孙中山先生，请他即速回国，主持大计；军政府还发布了《布告满清罪状檄》、《免税公告》等一系列电文、告示。12日，军政府发布了致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等国领事的照会。

武昌起义就像晴天霹雳，清王朝惊恐万分，立即调集水陆兵力南下，企图夺回武汉三镇，扑灭革命。湖北军政府领导军民进行了艰苦的保卫武汉的战斗。

武昌起义的炮声像春雷，震撼着中国大地，在起义之后的50多天内，先后有14个省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省。10月22日，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焦达峰为都督；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联合会党发动新军起义，一举占领了西安城，25日组成军政府，推张凤翔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江西革命党于10月23日夜间在九江起义，30日占领南昌城，成立军政府，推吴介璋为都督。此后，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西、广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山东相继宣告独立，组成军政府。直隶（今河北省）、河南、东北三省、甘肃、新疆各省的革命党人也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争取本省独立，但因统治势力比较强大，一时未能独立。

九、就任临时大总统

各省相继脱离清政府以后，都各自建立了军政府，但各省之间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因此，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经过武汉方面和上海方面的积极筹备，12月3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且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12月12日，各省代表分别从上海和武汉到达南京。14日，代表们在江苏省谘议局开会，决定16日选举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此时，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派人到武汉，向革命派表示，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原先代表们在武汉开会时，为了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早日推翻清政府，曾经作过决议，即如果袁世凯能促使清皇帝退位，就推选他为临时大总统。如今既然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代表们便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等待袁世凯。

正在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了。

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欢欣异常。当即决定启程回国。本来，从美国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几天就可以到达上海。但是，他为了解决即将诞生的共和国的外交和财政问题，决定到欧洲进行游说，然后再回国。

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启程回国，12月20日，孙中山一行经过香港，胡汉民和廖仲恺等到轮船上同中山先生会晤，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专程前来相见。25日，船到长江吴淞口，上海军政府派建威号兵舰前去迎接。这天早晨，上海外滩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各国驻上海领事和外国记者也都赶来欢迎。当轮船来到码头还没靠岸时，身穿黑色西服的孙中山，神采奕奕，站在轮船的上层，微笑着向鹄立岸边的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孙中山刚一登岸，就被一群中外记者团团包围起来。有一位记者，挤到道面，冲着孙中山直接了当地问：“您这次带多少钱来啦！”原来在孙中山还没到上海之前，中外许多报纸纷纷传言，孙中山这次将带一笔巨款回国。孙中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没有一分钱，所带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孙中山下榻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宝昌路408号。他语重心长地对《民立报》的记者说：“从前的种种困难虽然已经破除，但今后还有比从前更大的困难。今日除非我们用一种真精神真力量，战胜这种困难，否则，过去的一切辛苦都将归于无效。”

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选举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团体纷纷给南京的各省代表打电报，表示：“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民国。兆众一志，全体欢迎。”海外的革命同志也致电国内，请求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内慰輿望，外镇强邻”。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45人在江苏省谘议局会场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是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3人，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每一个省的投票权只以一票为限，也就是说，每个省只能投一票。选举结果，孙中山先生以16票当选。一经宣布，全场顿时欢腾起来，全体代表起立，连声欢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代表们当即作出决议，由各省代表签名，写信给孙中山先生，派专人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先生来南京。还决定将选举结果立即电告中山先生及各省军政府。

在上海的孙中山获悉他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立即复电南京各省代表，表示接受。他在电文中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子身归

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他还在电文中表示，不久将去南京就职。同一天，孙中山又致电已经独立的各省都督，表示各省选举他为总统，只是认他为公仆。

1912年元旦。这一天，孙中山身穿黄色呢军制服，头戴军帽。上午10时，同专程前来迎接他的南京代表汤尔和、王宠惠及他的随行人员，乘沪宁铁路专车启程，前往南京。上海都督陈其美及同盟会的要人，还有军政各界人士，共数千人到车站送行。近万名群众，自动地汇集在火车站附近，争着看一看大总统的风采。当火车徐徐启动时，礼炮齐鸣，站台内外，欢声雷动。孙中山先生一行在沿途各站都受到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当天下午5时，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欢迎的人们早已等候在这里。火车进站后，礼炮齐鸣，军乐声声，欢迎的场面非常热烈。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太平天国时，也曾在这里设天王府。下午6时15分，孙中山一行所乘的专车到达总督衙门，下车后，孙中山换乘扎彩绸的马车直奔总统府。黄兴，徐绍桢等人在总统府门前迎候。

晚上10时，在临时大总统府大公馆举行大总统受任典礼。黄兴站在孙中山左边，徐绍桢站在右边，各省代表及各军政官员，分别列队站在台阶前。仪式庄严朴素。典礼开始，首先奏军乐，接着由景耀月报告临时大总统选举的经过，报告完毕，由孙中山宣读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于此誓于国民。

宣读誓词后，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接受临时大总统印，并亲自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盖在宣言书上，由胡汉民代为宣读。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采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1月3日，各省代表举行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同一天，根据孙中山的提议，经各省代表讨论，确定了临时政府各个部的总长和次长。临时政府下共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九个部。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

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革命党人多年为之流血奋斗的目标。中华民国在东方大地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正如孙中山所说：“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廉洁奉公，殚精竭虑，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日夜操劳，在他简朴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他亲自题写的“奋斗”条幅，表示他永不停息地奋斗、前进！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开创了我国宪法史上的第一章。

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政策、法令。临时政府奖励兴办工商业，欢迎华侨到国内投资。当孙中山在国外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便为未来的共和国设计了发展经济的蓝图。在他从欧洲发给湖北军政府的电报里，就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南京临时

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扫除积弊、改革陋习、建立新制的法令，如剪除男人的发辫、禁止妇女缠足，禁止买卖奴婢等等。临时政府为了改革教育，也制定一些政策。这些法令政策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希望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上，它比封建专制制度要优越得多。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震动了东西方的帝国主义。他们采取种种办法，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武昌起义后，为了迫使革命军和袁世凯妥协，便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出面，进行“调停”，12月初，南方革命军代表及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在上海开始和谈。正在和谈进行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并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大为恼火，否认南北双方所订的一切条款。

孙中山回国之初曾经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可是当他看到和议已即成事时，被迫作出让步。袁世凯打电报给孙中山，试探性的问他：如果清帝退位，选他当总统“有何把握”时，孙中山回电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他则正式宣布辞职，推举袁为总统。袁世凯在确知孙中山的保证后，便立即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发退位诏书，宣布退位。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当孙中山确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后，便于2月13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谕文。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总统的职务，同一天离开总统府，5日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终于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此，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

由于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辛亥革命果实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但是，辛亥革命把皇帝赶下台，建立了共和国，这是划时代的胜利。民主共和的潮流滚滚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

十、为共和继续奋斗

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第三天，在上海发表演说，说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实行。在此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辛功，宣传民生主义，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反复向革命党人说明，今后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振兴实业，在实业建设中，又以兴办铁路为“唯一之急务”。他自告奋勇，筹划60亿元，修建20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1913年2月，孙中山到日本进行经济考察，寻求日本朝野的帮助。

正当孙中山为振兴实业四处奔走的时候，1913年3月20日，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被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也使广大革命党人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警醒。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的消息后，立即回国。3月26日到达上海，当天晚上便在黄兴的住所召开紧急会议，极力主张兴师讨袁，发动第二次革命。黄兴、陈其美等人则主张对于宋教仁被刺一案，通过法律解决。孙中山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此时，袁世凯也在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内战。1913年6月，袁世凯派兵南下，进攻江西、南京，企图消灭国民党的势力。在孙中山的推动下，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此后，江苏、安徽、上海、广东先后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于7月22日宣布讨伐令，对讨袁军大张挞伐。湖口、南昌、南京先后陷落。其他各省因为力量薄弱，无法支持，宣布取消独立。至此，持续了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所掌握的最后一部分武装全部解散，七个省的地盘全部丧失。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逃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中，很多人情绪低落。孙中山不屈不挠，他决定整顿组织，重新振作起来。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高举讨袁的旗帜，为捍卫民主共和继续奋斗。

袁世凯镇压了革命党人后，加紧了复辟卖国的步伐，1915年12月，悍然称帝，准备在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当皇帝。

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恢复帝制的行为，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1916年3月23日，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他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公然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继续斗争。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领导了这场护法运动。8月25日，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决定组成护法军政府，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职务，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出师讨伐。

然而，军政府中的一些西南军阀，参加护法，只不过是借助孙中山的名望来扩充自己的地盘，对于孙中山讨伐段祺瑞的军事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由于段祺瑞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使得护法军政府内部发生了分歧。

1918年4月，军政府进行改组。孙中山反对军政府改组，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在向全国发表的通电中，向国民痛切宣告：“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他已经看出了西南军阀同北方的段祺瑞政府，都是一样的货色，军阀争雄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军阀专制，武力乱国的艰难年代，不避艰险，不辞劳苦，为维护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重大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先后失败，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混战的年代。

1918年6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在挫折和失败中彷徨。1917年苏俄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通过重重迷雾传到中国。1919年北京发生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两件大事，使孙中山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上海期间，他一面撰写论著，总结斗争经验，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写成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一面积极筹划，继续同军阀斗争。

从1922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多次派人会见孙中山，李大钊、林伯渠都曾到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同他讨论改组国民党的事。苏俄也派代表越飞多次同孙中山会谈。孙中山真诚的接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开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孙文越飞宣言》。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由广州经上海、日本北上，共商国家大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边，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历尽艰辛，鞠躬尽瘁。

